

译学研究质疑三题

——兼论科学论译

贺文照

(嘉兴学院外国语学院, 浙江嘉兴 314001)

摘要: 该文讨论了三个问题, 翻译学概念的界定分歧, 译学研究中定量分析法必要性以及中国译学中的价值取向。要使翻译学研究的结论科学可靠, 顺利建立翻译学, 就必须科学地认识翻译, 并且用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

关键词: 翻译学; 科学; 质疑 **中图分类号:** H059

**A Discussion on Three Aspects of Translation Studies: The Importance
of Scientific Stud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ranslatology**

HE Wen - zhao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Jiaxing University, Jiaxing, Zhejiang 314001)

Abstract: From a scientific point of view, this paper discusses three aspects of the present translation studies among Chinese scholars, the differences in definition of translatology, the refusal of quantitative analysi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the valuation judgment in the advocacy of the construction of so - called Chinese Translatology. The author argues that it is essential to study translation scientifically in order to construct Translatology as a science.

Key words: translatology; science; discussion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 - 6781(2007)04 - 0084 - 04

目前, 翻译学还是一门颇有争议的“学科”, 甚至这门学科是否已经建立都有疑问。但十几年来, 译界学人们不懈努力、勇于探索, 也留下了丰富的文献, 译界学人们所留下的成果都是非常宝贵的财富。笔者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想法开始研读相关文献。文献大体分为两类, 一类是主张建立翻译学的研究工作者围绕翻译构建所阐述的一系列观点, 另一类是主张建立翻译学的论者与反对建立翻译学的论者之间所进行的辩论。研读这些文献, 笔者一方面看到了翻译理论研究以及学科建设所取得的成就, 另一方面也对其中一些文章阐述的观点以及阐述观点的方法产生了疑问。

在研读文献的过程中, 对一些基础性的问题笔者也进行了反复思考, 如翻译学应该是什么样的一门学科, 翻译学研究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方法进行, 翻译学研究应不应该渗透研究者的个人价值观等。针对这些问题, 不同的论者可能会有不同的答案。本文无意涉及所有的观点及流派, 仅仅是想从科学研究的角度提出作者的质疑, 在此暂且称之为科学论译。准确地说, 本文试图从方法论层面提出疑点以供翻译学创建者们参考。

一、翻译学该如何定义

本部分将对翻译学定义的来龙去脉进行梳理, 从整体性和一致性角度指出翻译学界一些定义不一、相互矛盾的问题。

就笔者所掌握的文献来看, 我国最早将“科学”这一概念引入翻译研究领域的为董秋斯。董秋斯认为翻译“有一定的客观规律可以遵循”, “并不完全靠天才和灵感”。^[1]这就是说翻译中必然存在可以用科学方法进行观察和概括的规律和特征。20世纪80年代末, 谭载喜呼吁建立翻译学, 其宗旨就是“揭示”翻译过程的客观规律, 探求关于翻译问题的客观真理, 给实际翻译工作提供行动指南。^[2]此后, 以建立翻译学为目标的译学研究蔚然成风, 已经成为中

收稿日期: 2007 - 01 - 07.

作者简介: 贺文照(1967 -), 男, 湖南攸县人, 嘉兴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

国大陆翻译理论研究领域的一大方向。

在2000年出版的专著中，谭载喜仍然认为翻译学是研究翻译的科学，并且坚持认为翻译学的目的就是揭示翻译中的客观规律^[3]。

杨自俭认为翻译学可以定义为“研究翻译的思维规律和方法的科学”。杨还认为这个定义比谭氏的定义“更能揭示翻译学的实质，明确翻译学的科学任务，理论上具有更高的概括性”。^[4]这里先不论谁的定义更能揭示翻译学的实质，从语言表述上来看，谭氏定义中的用语较杨氏定义的用语宽泛而笼统，因此要说理论上的概括性，谭氏的定义似乎更胜一筹。

刘重德认为翻译学是全面系统地研究翻译中的双语转换规律的科学，是研究翻译思维规律和方法的一门基础科学。^[5]很明显，刘的定义与杨的定义比较接近。

黄振定的定义是“翻译活动中的语言艺术创造的客观规律性的科学”。^[6]黄氏主张翻译学是艺术论和科学论的统一，因而从其翻译学的定义看，黄氏也极力想将两者融进翻译学的定义中去。黄的著作及论文论及，在文学作品的翻译，艺术性大于科学性；而在科技等实用性翻译中，则科学性大于艺术性。但是，对整个翻译活动来说，是艺术性为主还是科学性为主，黄氏并没有结论；至于翻译学中是艺术论为主还是科学论，黄氏也没有论及。^[7]如果笔者对黄的翻译学定义没有理解错，在黄氏的定义中，“语言艺术创造”不仅限制着“客观规律性”，而且限制着“科学”这一核心词。因此，至少从黄氏的翻译学定义来看，黄的翻译学不是“二论”的统一，而是单一的艺术论。黄氏运用唯物辩证法对翻译现象进行解释，以及他对翻译活动中艺术性和科学性相互依存关系的透彻分析提升了翻译研究的理论层次，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认知视野。不过，笔者认为，黄氏的定义需要进一步完善，以更加明确地反映其艺术论和科学论的统一。

王东风和楚至大肯定翻译活动受客观规律制约，但是在引用《现代汉语词典》和 Webster's New World Dictionary 关于科学的定义时，他们强调的却是“知识体系”（systematized knowledge），^[8]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忽略了 Webster's New World Dictionary 关于科学定义的关键内涵“in order to determine the nature or principles of what is being studied”，这样一来，科学的定义简化成了“知识体系”或者“系统的知识”，从而有可能将翻译学理解为一般的学科而非论者文中所倡导的科学。

以上各家的定义，各有不同的视角，把它们独立开来看都还有商榷的地方，综合起来考虑，分歧尤为明显。翻译学正处在探索之中，对翻译学的界定存在分歧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既然以上各家都将翻译学看成一种科学，就应该考虑翻译学这一基本概念的普遍性和统一性，这是追求科学性的重要体现。

按照杨连生的说法，科学是人们对自然界，社会和思维领域客观规律进行不断探索和积累所形成的知识体系。另外，“科学作为一种认识活动，不仅要积累知识，正确地反映，解释客观事实；而且要对事物的发展趋势作出预测”^[9]。定义一门学科时，尤其是在一门学科还不是很成熟，体系还不是很完善的时候，要注意概念的概括性，所下定义要具有较深远的预见性，这是科学论译的一个基本要求。

如果说中国的翻译理论体系已基本建立，^[10]那么从理论的一致性来看，翻译学论者的定义方法仍有欠科学的地方。这种分歧有可能影响翻译学体系的整体构建，成为翻译学发展的障碍。翻译理论的研究和翻译学的建立是一项宏伟大业，需要翻译理论研究者个体的努力，也需要众多理论工作者共同合作。这种合作以及达成认识上的一致虽然不能靠行政命令实现，但也应该是科学论译者自觉和必然的行动选择。因此，对翻译学的概念进行综合性思考，对翻译学界定方法进行整合势在必行。

二、不必拒绝定量方法

十多年前，范守义《模糊数学与译文评价》一文首次探索性地将量化方法引入翻译研究领域。^[11]徐盛桓随即也对运用数学模型来评估译文质量作了进一步研究，并讨论了这一方法的前景。^[12]杨自俭认为“这是一个有创见的尝试”，^[4]也有人讥笑这种尝试为“叫人越看越‘模糊’”。^[13]除此之外，也有人鲜明表示，翻译学是一门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精确定量分析法不适合于本学科。^[14]对此，笔者认为值得商榷。的确，翻译学之类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和人，人们对其研究对象的把握，较自然科学研究对象难；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全然拒绝使用定量分析法。

1) 定性和定量分析方法各有优点，也各有适用范围。但是，如果承认翻译学的研究对象是客观存在的，就不能不接受这样的推论，我们研究的对象既表现出某种质的区别性特征，也存在某种量的规定性。在面对较为复杂的研究对象时，定性的研究方法来得容易和简单些，它也能使我们把握到研究对象的某些特性，但单纯的定性分析法会以牺

性准确作为代价。应该说,尽可能追求准确是科学精神的体现,从这一点出发,翻译学研究有必要采用较为精确的定量分析法。

2) 某些社会科学的数学化经历值得翻译研究领域借鉴。经济学在 200 年前就引进了数学,进而使经济学研究结论更为准确可信。语言学中也渗透了数学的方法,统计语言学和数理语言学就是语言学和数学交叉产生的交叉学科。心理学的研究对象相当复杂,但也用上了量化的办法,其心理测试的方法就大大增强了心理学研究结论的说服力。因此,在翻译学研究中我们也不能否认量化方法的适用性,否定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

3) 翻译学研究对象的复杂性,是我们现阶段无法理清的。即便是现阶段的翻译研究也已经跳出了如何译的小圈子,因此,可以断言未来的翻译研究将更为深入和广泛。如果以人文社会科学为理由,断定自然科学的方法在翻译学领域绝无用武之地,或者以量化分析法的成熟为由对其采取讥笑的态度,是很错误的态度。对于翻译这种复杂的社会现象,有必要调动各种可行的研究手段,如果一开始就设下种种条条框框,只会限制和束缚翻译理论研究的发展。

笔者认为,之所以拒绝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其实很大程度是因为我们对自然科学知之甚少(包括笔者在内)。现阶段,从事翻译研究的人员多以外语院系出身,一般缺乏自然科学学术背景,很难设想他们会自觉地采用定量分析法来研究翻译。而没有比较完善的知识结构和比较广博的学术背景,要洞察翻译学的奥秘是相当困难的。

还是让我们回到翻译研究的量化方法这个话题上来。

除了前面提到的范守义在量化方法上有探索外,穆雷运用模糊数学来评估译文方面进行了探索。^[16]方梦之运用量化的方式对我国 20 世纪下半叶翻译研究的各分支领域的状况进行了统计和分析,^[17]比较准确地反映了我国该阶段翻译研究的真实面貌。

近年来,翻译研究的语料库途径在我国的翻译研究中逐渐升温。翻译研究的语料库途径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统计这种计量的方式,^[18-21]计量的运用在翻译研究中某种程度上、一定的范围内弥补了自省方法过于主观的不足之处。语料库途径的引入,使得翻译研究既有定性分析的简洁性,又有定量的分析的可靠性,既有自省式的思考,又有实证性的考证,将翻译研究引领到了一个定性和定量方法互补的新境界。

在国内,随着第一个大型英汉双语对应语料库的建成,^[22]标志着翻译的语料库研究途径已经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在最近出版的《双语对应语料库:研制与应用》^[22]一书中,就有大量使用定量方法研究的成果。由于采用了统计这一定量方法,有确切的数据作依据,得出了很多平常情况下无法得出的结论。虽然语料库途径不等于量化分析,量化分析也不只是语料库途径中才有运用,但是,这一进展无疑表明定量的方法运用于翻译研究不仅仅是一种可能,而且已经成为事实。

三、价值取向与翻译学研究

科学研究遵循四个基本原则:穷尽性、一致性、简洁性和客观性。客观性要求研究者避免主观因素的介入。尤其以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更要注意避免研究者的价值观对研究结果带来影响。但是,最近在讨论翻译学的构建时,有人鲜明地提出价值观介入的合理性,^[14]这不能不让人担忧,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将会构建出一个什么样的翻译学?

这种观点不是偶然的,它与目前译界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翻译学的呼声相呼应。从民族主义的立场出发,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学的提法非常符合我们的民族利益,但是这种提法却是认识上的一个误区,对此,朱纯深^[23]和张南峰^[24]两位先生作了精辟的分析。在这里,笔者认为,这种民族感情为出发点的价值取向介入,会使我们对翻译学的认识失去应有的理性,得出片面、甚至荒谬的结论。胡清平在阐述中国特色的翻译学的“深远的指导意义”时,认为几百年后,“英汉之间的翻译将成为全世界翻译工作的主要部分,中国的翻译工作者也将成为双语对译的主力军”,而能担任此重任者“非中国翻译家和译论家莫属”;他还进一步预测,“在世界上只剩下两种语言,英语和汉语时,英汉翻译几乎成为全球译员的唯一任务,中国特色的译学将会在世界译坛占主导地位。”^[25]

倘若是在别的场合,这样描绘壮观的远景,的确会让国人感到自豪。但把这种没有什么根据的假设当作建设中国特色的翻译学的依据,从严谨的态度来说,难以成立。我们不妨分析一下其中的谬误。

1) 几百年后,世界语言状况如何变化,很难预测。认为英汉两种语言将主导世界的说法没有什么根据。这种主观愿望支配下的自由想像不能代替严密的论证。

2) 即便是按照胡想像那样的趋势发展,我们也不能保证汉语和汉文化不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样中国译学仅有的一点依据不复存在。以自我为中心,静态地看待世界发展,这是导致错误结论的原因之一。

3) 再假设胡想像的前提得以实现,世界上只剩下英汉两种语言,在其他语言消失并向英汉两种语言趋同的过程

中，世界上其他民族也完全有可能非常熟练地掌握甚至精通英汉两种语言，这样的话，能够担当英汉互译重任的恐怕不仅仅是中国翻译家。可以肯定的是，倘若有那么一天，汉语绝对不仅仅是中国人的专利了，那么中国译学存在的语言优势将无法凸现出来。

由此可见，主观价值取向的过分介入，将会严重影响译学研究的客观性，从而使译学研究的结论大打折扣。

当然，在选择研究什么时，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价值观或价值取向，无论是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科学家还是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家都如此。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各自有不同的特征，这也是不争的事实。有时候，也许研究者的取向和其对研究对象的价值观存在着一致或者相互排斥的情况，进而可能影响到研究者的动机。如果我们不仅仅是想发一些随感式的个人思考，而是将追求真理设定为自己的终极目标，就有必要克制自己价值观对研究过程可能造成的消极影响，以保证研究结论的客观性和可靠性。

四、结束语

一门学科的建立需要长时间的努力，一蹴而就现实，一门学科的建立也不是一两个人的大声呼吁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因此出现以上提到的问题不足为奇。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门具体的学科，翻译学是否是科学不仅仅是名称的问题，还必须将科学的内涵落实到翻译学的研究中去。其中采取何种方法就是保证其科学性的一个重要因素。科学论译既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也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远非几篇文章、几次辩论可以得到圆满解决。正如有识之士们所提倡的那样，当务之急是要加强理论学习，提高理论修养，^[14,26]在翻译学研究中，自觉地按科学规律办事。只有这样，翻译学这门年轻的学科才有可能成长为一门成熟的科学。

参考文献：

- [1] 董秋斯. 论翻译理论的建设 [A]. 载罗璋璋编, 翻译论集 [C].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4: 536~544.
- [2] 谭载喜. 必须建立翻译学 [J]. 中国翻译, 1987, (3): 1~4.
- [3] 谭载喜. 翻译学 [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0.
- [4] 杨自俭. 翻译新论 [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4: 460~464.
- [5] 刘重德. 关于建立翻译学的一些看法 [J]. 外国语, 1995 (2): 27~28.
- [6] 黄振定. 翻译学——艺术论和科学论的统一 [M].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8.
- [7] 劳陇. “翻译活动是艺术还是科学?”——对“翻译学——艺术论与科学论的统一”的一点意见 [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0 (9): 62~63.
- [8] 王东风. 楚至大. 翻译学之我见——与劳陇先生商榷 [J]. 外国语, 1996 (5): 8~12.
- [9] 杨连生. 科学学 [M]. 北京: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1988.
- [10] 杨自俭. 关于建立翻译学的思考 [J]. 中国翻译, 1989 (4): 7~9.
- [11] 范守义. 模糊数学与译文评价 [J]. 中国翻译, 1987 (4): 18~20.
- [12] 徐盛桓. 译文质量评估的数学模型 [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1987 (4): 90~96.
- [13] 张经浩. 翻译学: 一个未圆且难圆的梦 [J]. 外语与外语教学, 1999.
- [14] 吕俊. 对翻译学构建中几个问题的思考 [J]. 中国翻译, 2001 (4): 6~9.
- [15] 迈纳·阿. 方法论导论 [M]. 王路译. 北京: 三联书店, 1991.
- [16] 穆雷. 用模糊数学评价译文的进一步探讨 [J]. 外国语, 1991 (2): 68~71.
- [17] 方梦. 20世纪下半叶我国翻译研究的量化分析 [J]. 外语研究, 2003 (2): 50~60.
- [18] 丁树德. 浅谈西方翻译语料库研究 [J]. 外国语, 2001 (5): 61~66.
- [19] 廖七一. 语料库与翻译研究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0, (5): 380~384.
- [20] 张美芳. 利用语料库调查译者的文体——贝克研究新法评介 [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2 (3): 54~57.
- [21] 柯飞. 双语库: 翻译研究新途径 [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2 (9): 35~39.
- [22] 王克非. 双语对应语料库: 研制与应用 [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4.
- [23] 朱纯深. 走出误区 踏进世界——中国译学: 反思与前瞻 [J]. 中国翻译, 2000 (1): 2~19.
- [24] 张南峰. 特性与共性——论中国翻译学和翻译学的关系 [J]. 中国翻译, 2000 (2): 2~7.
- [25] 胡清平. 澄清翻译理论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J]. 中国翻译, 1999 (5): 2~5.
- [26] 王东风. 中国翻译研究: 世纪末的思考 [J]. 中国翻译, 1999 (1): 7~11.